

白居易《长恨歌》多重主题探析——基于叙事学与历史诗学的解构

陆钱安

上海闵行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

【摘要】白居易《长恨歌》作为中国古典叙事诗的巅峰之作，其主题阐释历来存在“讽喻说”与“爱情说”的二元对立。本文通过叙事学视角解构文本的复调结构，结合唐代政治文化语境与白居易的创作心理，提出主题三重性理论：表层为帝王爱情悲剧的浪漫书写，中层为历史兴衰的政治隐喻，深层为生命无常的哲学观照。通过分析叙事视角转换、意象系统建构与历史真实性的诗学处理，揭示白居易在传统主题框架下对人性、权力与命运的多维思考。

【关键词】白居易；长恨歌；主题解构；叙事诗学；李杨爱情；历史隐喻

【收稿日期】2025年5月7日

【出刊日期】2025年6月5日

【DOI】10.12208/j.ssr.20250213

Analysis of multiple themes in Bai Juyi's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 Deconstruction based on narratology and historical poetics

Qian'an Lu

Shanghai Minh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hanghai

【Abstract】 As the pinnacle of classical Chinese narrative poetry, Bai Juyi's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has long been subject to a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satirical theory" and the "love theory." This paper deconstructs the polyphonic structure of the text from a narrat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grating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Tang Dynasty with Bai Juyi's creative psychology, to propose a tripartite theory of themes: the surface layer is the romantic portrayal of imperial love tragedy, the middle layer is the political metaphor of historical rise and fall, and the deep layer is 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By analyzing the shifts in narrative perspectives, the construction of imagery systems, and the poetic treatment of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this paper reveals Bai Juyi's multidimensional contemplation of human nature, power, and fate within the traditional thematic framework.

【Keywords】 Bai Juyi;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Thematic deconstruction; Narrative poetics; Li Yang love; Historical metaphor

1 主题阐释的学术史困境与突破路径

1.1 传统二元论争的局限性

白居易长篇叙事诗《长恨歌》被清代赵翼誉为“自是千古绝作”，其艺术生命力历经千年而未衰。然自诗成至今，学界对其主题阐释始终众说纷纭。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陈寅恪倡立“讽喻说”与王运熙主张“爱情说”之辩，实质上折射出儒家诗教传统与文学审美价值的内在张力。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构建以“惩尤物、窒乱阶”为核心的政治阐释框架，强调白居易借李杨情事建构政治讽谏的诗歌范式；王运熙则立足民间接受史维度，论证该诗爱情主题在传播过程中形成

的审美合法性。此二元论争遮蔽了文本的多重阐释空间——白居易《与元九书》既申明“文章合为时而著”的诗教理念，亦肯定“韵协言顺”的抒情特质。近年张中宇等学者虽提出“双重主题说”，然尚未能有效阐释多重意义共生之文本机制。

1.2 海外汉学的解构视角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追忆》中提出，《长恨歌》通过重构历史记忆揭示了私人情感与集体记忆的复杂互涉。该学者进一步指出，白居易在诗学实践中消弭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界限，成功建构了一个虚实交融的诗学场域，促使读者在帝妃情事与王朝兴

衰之间建立深层的意义关联。该研究范式为突破传统主题二元对立的阐释框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照。

1.3 叙事学理论的应用价值

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叙事分层理论为《长恨歌》的复调性解构分析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在故事层面（histoire），“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叙事起点已预设了双重阐释学路径：既可解作儒家伦理体系下的君主德性批判，亦可视为浪漫主义叙事范式的情感铺陈。诗人通过“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叙事策略，在保持《旧唐书·后妃传》所载杨玉环入宫轨迹的历史真实性的同时，刻意避讳其曾为寿王妃的伦理困境，这种历史真实与诗学真实（poetic truth）的辩证关系，构成了文本的第一个阐释学张力场域。

话语层面（discours）的叙事操控呈现出更高阶的修辞复杂性。在构建李杨情感关系时，“金屋妆成娇侍夜”的私密场景与“姊妹弟兄皆列土”的政治后果通过时空蒙太奇形成镜像结构，叙事者藉此建构出潜隐的道德评价体系。及至马嵬之变的叙事单元，“六军不发无奈何”的客观史笔陡然转为“宛转蛾眉马前死”的主体限知视角，这种叙事聚焦（focalization）的漂移现象，实现了政治批判维度与人性悲悯维度的共时性呈现。

元叙事层（meta-narration）的诗学改造最具理论阐释价值。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坦承“时之所重，仆之所轻”的创作悖论，这种诗学矛盾性完整投射于《长恨歌》的叙事建构中。通过将史籍记载的“赐死杨贵妃”改写成“君王掩面救不得”，诗人藉由叙事视角的内化机制，将历史事件（historical event）转化为情感创伤（emotional trauma）。而“临邛道士鸿都客”的仙界寻访情节，更是在元叙事层面完成了对历史真实性的诗学超越，建立起了中国叙事传统中罕见的“诗史互文”范式。

2 表层叙事：爱情悲剧的诗意重构

2.1 帝王爱情的平民化书写

白居易通过叙事称谓的置换策略，将李隆基的帝王身份泛化为“汉皇”这一原型意象，使叙事获得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普遍意义。在“芙蓉帐暖度春宵”的场景建构中，“春宵”“帐暖”等日常化意象群成功实现了宫廷秘事向普世情感体验的诗学转化。相较于《诗经·卫风·硕人》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的贵族女性物化书写传统，白居易的“云鬓花颜金步摇”通过动态美学（dynamic aesthetics）的塑造，赋予杨妃形象以鲜明的主体性温度。

2.2 悲剧结构的双重逆转

诗歌前半段严格遵循亚里士多德式“突转-发现-苦难”（peripeteia-anagnorisis-pathos）的悲剧发展逻辑，后半段则通过“方士寻魂”的超现实叙事打破线性时间秩序，建构起“现实界-超现实界”的双重诗学空间。这种叙事结构的革新使爱情悲剧突破具体历史语境，获得形而上的永恒价值。相较于李商隐《马嵬》中“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的直白历史讽喻，白居易的悲剧处理展现出更复杂的美学张力。

2.3 身体叙事的政治隐喻

从“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感官书写到“宛转蛾眉马前死”的暴力场景，杨妃身体始终处于福柯（Michel Foucault）“身体政治”（biopolitics）理论框架下的客体化地位。帝王对妃子身体的占有象征着权力欲望的具象化，而军队对身体的暴力处置则揭示了权力失序的必然结果。白居易通过身体意象的戏剧性对比，完成了对开元天宝政治生态的隐性道德审判。

3 中层隐喻：政治讽喻的编码系统

《长恨歌》建构的隐喻网络突破了传统训诂学阐释的显性劝诫范式。通过音乐意象的嬗变与空间书写的拓朴学转换，诗人将中唐知识阶层对权力结构的深层焦虑，编码为充满阐释张力的诗学符号。这种复杂隐喻系统的解码，需要借助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与文化符号学（Cultural Semiotics）的双重视野方能实现完整阐释。

3.1 音乐意象的权力象征

“霓裳羽衣曲”的符号嬗变构成贯穿文本的政治讽喻主线。该乐舞的源流本身已暗含文化权力博弈：《新唐书·礼乐志》记载玄宗将胡乐《婆罗门曲》改造为道调法曲的过程，实为“以夏变夷”的文化统合策略。白居易在“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并置书写中，刻意模糊军事叛乱与乐舞终止的因果关系，使音乐意象成为王朝命运的镜像隐喻。

这种音乐政治学在三个阐释维度展开：

（1）声律秩序与统治合法性

诗中“缓歌慢舞凝丝竹”的视听呈现，实为《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理念的具象化表达。玄宗朝通过重组太常寺、设立梨园等制度性举措，将礼乐体系建构为君权神授的仪式化证明。而“仙乐风飘处处闻”的盛世图景，恰与《通典·乐典》“王者功成作乐”的记载形成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

（2）声音政治的失控与重构

安禄山叛军使用的羯鼓作为胡乐符号，与霓裳羽衣曲形成文化权力对抗。《安禄山事迹》载其“尤爱羯

鼓，常自击之”，这种音乐偏好被白居易转化为“渔阳鼙鼓动地来”的破坏性能量。诗人通过声景对立（丝竹/鼙鼓）的符号化处理，隐喻华夷秩序崩溃的文化危机。

（3）音乐记忆的创伤转化

在仙界重逢场景中，“犹似霓裳羽衣舞”的细节具有深刻的反讽意味。曾经象征帝国荣光的乐舞，此刻蜕变为历史创伤的记忆载体。这种符号转化与《旧唐书·音乐志》“自天子播迁，乐工散亡”的史实形成对话，揭示出礼乐制度失范后的文化创伤机制。

3.2 空间书写的政治地理学

诗歌的空间叙事绝非简单的场景转换，而是通过地理符号的编码策略，建构出完整的权力拓扑学（topology of power）体系。从骊山宫苑到马嵬驿，再至蓬莱仙岛，三个核心空间形成了“神圣空间-阈限空间-补偿空间”的辩证运动结构。

（1）骊宫：权力的拓扑学中心

“春寒赐浴华清池”的空间书写，构成对《两都赋》帝都赞颂传统的解构性戏仿。班固笔下“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的宇宙论帝都意象，在此被重塑为欲望滋生的温床。通过“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感官化描写，骊山从《史记·封禅书》记载的祭祀圣山异化为情欲宣泄的“异托邦”（heterotopia），完美印证福柯关于“空间规训产生颠覆性力量”的理论阐述。

（2）马嵬坡：阈限空间的暴力叙事

这个地理符号在诗中呈现出三重阐释悖论：空间身份的模糊性：作为非战场亦非宫阙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成为君权失效的见证场域。

身体政治的冲突：“宛转蛾眉马前死”将女性身体置于军事暴力的凝视之下。

记忆载体的重构：从“不见玉颜空死处”到“马嵬坡下泥土中”的空间所指位移，暗示官方历史记忆的建构本质。

（3）蓬莱仙山：补偿性乌托邦的虚妄

诗人对山意象的处理构成对《史记·封禅书》神仙叙事传统的颠覆。当方士“排空驭气奔如电”时，传统仙话中的永恒乐土被解构为虚实交织的幻象空间。这种书写策略与郭璞《游仙诗》的遁世倾向形成对话，暴露出中唐文人面对权力真空时的精神困境。

3.3 物质符号的权力解码

白居易对器物系统的符号化安排，建构起另一重隐秘的讽喻维度。从金步摇到钿合金钗，这些物质符号的流转轨迹成为权力关系变迁的物化见证。

（1）服饰系统的政治语义

“云鬓花颜金步摇”中的首饰，在《释名·释首饰》中本为“步则动摇”的仪容规训工具，在此却被重构为惑主媚上的罪证。这种符号倒置与《女则》《女诫》中的妇容规范形成张力，揭示出儒家礼教在极端权力结构中的功能性失效。

（2）信物交换的权力隐喻

“钗留一股合一扇”的细节暗含《周礼·考工记》“匠人建国”的空间政治学原理。被拆解的信物既象征情感契约的破碎，也隐喻中央集权（完整金钗）向藩镇割据（分裂玉簪）的现实政治转化。这种书写策略与杜甫《哀江头》“明眸皓齿今何在”形成互文关系，但白居易更强调物质符号的政治负载功能。

（3）贡品系统的镜像书写

“翡翠衾寒谁与共”中的南诏贡品，与“西出都门百余里”的逃难路线形成地理经济学的呼应。诗人通过物质流动轨迹的镜像书写，暗示朝贡体系崩坏导致的权力失衡。这种批判策略在《新乐府·红地毯》中同样显现，构成白居易政治讽喻诗学的标志性特征。

3.4 时间政治的叙事操控

白居易对时间意象的处理远比传统阐释复杂。“迟迟钟鼓初长夜”不仅是爱情场景的渲染，更是对《春秋》笔法的隐秘呼应。通过三种时间维度的交织，诗人建构出多声部的讽喻系统：

（1）循环时间与天命观解构

“七月七日长生殿”的七夕母题，本应指向《诗经·小雅·大东》的星辰崇拜传统。但诗人将牛女相逢的永恒轮回改写为“夜半无人私语时”的现世欲望叙事，这种时间政治学彻底消解了“天道循环”的合法性论述。

（2）断裂时间与历史创伤

从“六军不发无奈何”到“魂魄不曾来入梦”的叙事断裂，制造出集体记忆的创伤性创口。这种叙事策略与《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春秋笔法形成对话，通过关键时间节点的省略迫使读者介入意义重构。

（3）虚幻时间与权力补偿

仙界场景中的“山在虚无缥缈间”，构成对《楚辞·远游》时间观的创造性戏拟。当方士穿越“忽闻海上有仙山”的时空裂缝时，传统仙话的永恒性被降格为权力幻灭后的精神补偿机制。

这种多层隐喻系统的建构，证明《长恨歌》的政治讽喻已突破传统“美刺”诗学的窠臼，通过高度符号化的诗学编码，完成对帝国兴衰的本质性思考。白居易创造性地融合儒家比兴传统与世俗审美趣味，建构起中国诗歌史上罕见的复调性文本，这恰是其超越时代局

限的根本原因。

4 深层结构：命运无常的哲学观照

4.1 佛教“无住”思想的渗透

“悠悠生死别经年”中的时间焦虑，与《金刚经》“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的般若智慧形成哲学对话。白居易晚年佛教信仰在诗中显现为“魂魄不曾来入梦”的绝望与“昭阳殿里恩爱绝”的顿悟，展现出对世俗情感的形而上超越。相较于元稹《遣悲怀》的现世悼亡书写，白居易的生死观更具本体论色彩。

4.2 道家“物化”思维的呈现

“芙蓉如面柳如眉”的隐喻系统，将人体器官转化为自然意象，暗合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论思想。这种物化修辞不仅实现容貌的美学转化，更通过消解肉体存在的终极性，赋予马嵬之变以哲学悲悯色彩。相较于李贺《李凭箜篌引》“昆山玉碎凤凰叫”的奇诡想象，白居易的物化书写展现出更纯粹的形而上追求。

5 主题共生机制的诗学创新

5.1 “复调叙事”的构建策略：多声部交响中的主题共振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强调文本中多重意识主体的平等对话关系，《长恨歌》通过三重叙事视角的交织渗透，构建了超越单一价值评判的阐释空间，奠定了主题共生机制的诗学基础。

(1) 帝王视角的享乐主义书写

感官沉溺的修辞策略

诗人运用“春宵苦短日高起”“芙蓉帐暖度春宵”等高密度感官意象群，系统铺陈玄宗对物质享受的病理性沉迷。该书写策略并非对奢靡生活的简单道德批判，而是通过极致化的美学呈现，深刻揭示了权力巅峰个体的生存困境——绝对权力持有者反而更易陷入精神虚无的恶性循环。

时间感知的扭曲化

“缓歌慢舞凝丝竹”的绵延性时间体验，与“惊破霓裳羽衣曲”的瞬时断裂形成结构性对照，具象化呈现享乐主义对危机感知机制的麻痹效应。与杜甫《丽人行》中“炙手可热势绝伦”的旁观批判不同，白居易的创作赋予了帝王视角自我言说的叙事主体性。

(2) 臣民视角的离散体验

空间移动的创伤性

“千乘万骑西南行”的逃难场景通过宏大叙事中的微观细节捕捉（“尘埃不见咸阳桥”），实现了个人

命运与历史洪流的有机嵌合。该技法虽与《诗经·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构成意象互文，但突破了传统抒情诗的个体悲叹模式，升华为具有历史普遍性的群体创伤记忆。

身体政治的微观透视

“黄埃散漫风萧索”的感官化环境描写，与“云栈萦纡登剑阁”的拓扑空间建构相互叠加，使臣民视角转化为权力体系崩塌的物理见证者。相较于《旧唐书》对安史之乱“损官军四万馀”的量化记载，诗歌通过具身性认知重构了历史经验的真实性。

(3) 超越视角的宇宙追问

仙凡对话的哲学维度

“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魂叙事本质上构成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哲学勘探。方士作为人神中介的角色设定，其行动轨迹（人间—冥界—仙界）构建了存在主义的三重空间隐喻。与屈原《天问》的直陈式诘问不同，白居易将形而上思考潜隐于叙事进程的肌理之中。

物象系统的象征转化

“钿合金钗寄将去”的物质性传递行为，在超越性视角下完成世俗意义的消解，蜕变为“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永恒性符号。正如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所言：“艺术作品的存在就是建立一个世界”，诗人通过物象的提纯与转化，成功建构了超验的诗性世界秩序。

5.2 “诗史互文”的文本张力：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博弈

白居易对历史素材的诗学改造并非简单的艺术加工，而是在“实录”与“虚构”的辩证关系中构建张力场域，使文本获得历史维度与哲学深度的双重真实性。

(1) 时间叙事的模糊化策略

此类诗学改写使历史事件挣脱编年体框架的束缚，获得审美重构的自由度。正如宇文所安在《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中所指出的：“白居易运用诗歌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对抗性张力，完成了对传统史传叙事的超越。”

(2) 政治暴力的美学净化

身体书写的物象替代

对比新旧《唐书》对杨妃之死的直呈式记录（“缢杀于佛堂”“裹尸以紫茵”），白居易以“花钿委地无人收”的审美化意象完成暴力场景的转喻性处理。这种“以物代人”的叙事策略，既规避了直书帝王过失的伦理风险，又通过符号化置换实现了诗学批判——将个体死亡抽象为历史暴力机制的象征载体。

权力关系的叙事留白

“六军不发无奈何”的模糊化表述，隐匿了陈玄礼兵谏的具体过程（参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请诛国忠以谢天下”）。这种留白技法非但未削弱文本的批判力度，反而通过责任归属的悬置，引发更深层的权力反思：当军事力量僭越为道德裁判者，传统皇权合法性的根基将遭受何种冲击？

（3）历史记忆的情感重构

私人体验的公共化

玄宗“孤灯挑尽未成眠”的失眠细节纯属文学虚构（据《唐六典》载，唐代宫廷有专人司掌灯烛），但正是此类虚构使历史人物获得情感维度的真实性。相较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客观化叙述，白居易通过情感投射机制，使读者在审美共情中反思权力异化问题。

边缘史料的诗学激活

诗中“七月七日长生殿”的密誓场景源自民间口述传统而非正史记载。白居易将非官方历史记忆纳入诗歌文本，既构成对传统史学权威的挑战，又构建起多元历史记忆的对话场域。这种创作理念与后现代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提出的“小写历史”观形成跨时空呼应。

5.3 主题共生机制的理论意义

《长恨歌》通过复调叙事与诗史互文的双重创新，实现了中国叙事诗学的三重突破：

（1）解构历史书写的霸权性

通过帝王、臣民、方士三重声部的平等对话，白居易突破了《春秋》“为尊者讳”的史传传统。诗歌文本中的玄宗既是批判对象又是同情客体，杨妃兼具祸国红颜与爱情殉道者的双重身份。这种人物塑造的复杂性使文本拒绝单向度价值判断，成为罗兰·巴特在《S/Z》中定义的“可写文本”。

（2）重构诗歌的认知功能

相较于《诗经·硕鼠》等传统讽喻诗依赖显性道德训诫的创作模式，《长恨歌》通过多义性叙事策略，使诗歌从“载道工具”升华为“认知媒介”。读者必须在爱情、政治、哲学的多重阐释线索中自主建构意义，这一过程本身即构成对人性复杂性的本体论认知。

（3）开辟文人诗的新范式

与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主体性张扬、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主义批判不同，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创造出“史笔为骨，诗情为魂”的新型叙事诗范式。这种诗学范式直接影响了吴伟业《圆圆曲》、纳兰性德《木兰词》等后世创作，形塑了中国文学特有的“诗史互渗”传统。

6 结论：诗学创新的文化基因

《长恨歌》的主题共生机制本质上是中唐文化转型期的精神镜像。当韩愈、柳宗元通过古文运动重建儒家道统时，白居易以诗歌实践完成了更深层的革新——在解构历史权威话语的同时，构建起多维度的意义生成系统。这种诗学创新不仅确立了《长恨歌》的经典地位，更预表了宋代以降“诗史合一”情理交融的美学范式转型。在当下碎片化阅读主导的文化语境中，重审这种古典诗学智慧，或可为突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提供历史参照。

参考文献

- [1] 宇文所安. 中国“中世纪”的终结[M]. 北京：三联书店，2006：117.
- [2] 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M]. 北京：三联书店，2001：45.
- [3]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白春仁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8：79.
- [4] 谢思炜. 白居易诗集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5] 欧丽娟. 唐诗中的乐园意识[M]. 台北：里仁书局，2007.
- [6] Genette, G. Narrative Discourse Revisited[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版权声明：©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